

不可能像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对周边居民残暴而恣意（如后面即将登场的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从盘龙城土著的立场看，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外来者的统治，除了青铜兵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应该还是青铜产业带来的利益。外来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的合作，建立从找矿、采购、运输矿石、冶炼、铸造直到外销的整条产业链。这意味着本地人也能从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

在当时族邦林立的大环境下，盘龙城人不得不重视武备，从夯土城池到频频出土的各种青铜兵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青铜产业的运营又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不管是外来商裔与土著居民的合作，还是和周边族群的商业交换（购入铜、锡、铅矿石，出售铜锭和铜器），盘龙城人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盘龙城内外没有发现乱葬尸坑以及带伤或被肢解的零碎人骨，就是明显的证据。

可以这么说，盘龙城的商人不仅主动放弃了中原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仪式，还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一种比中原更和平的文化。

南土和平祭祀

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出现过很多防洪用途的“古城”和稻作水利设施，尤以天门石家河古城规模最大。然而，江汉地区却一直没有发生阶级分化，也没有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

当地的宗教形态：祭祀方式以摆放和掩埋器物为主，很少有杀人和杀牲畜的行为。

比如，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以埋葬陶筒形器和陶缸为主，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则制作大量泥塑人偶、动物和杯子等，然后烧制成粗陶并掩埋。这样一种和平的宗教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族群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早期国家的暴力统治功能，而且还能消耗社会剩余产品，避免了因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出现职业统治阶层。⁹

当商人到来之后，国家权力虽已不可避免，比如，盘龙城的城池和宫室显然代表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但本地民间宗教仍起着融汇和同化的作用。发掘显示，盘龙城商人经常举行一种不杀人的祭祀：在土坑或灰烬里摆放陶器、铜器或玉器，然后掩埋。

盘龙城外的王家嘴有两座祭祀坑H6和H7，属于盘龙城文化五期（此时，城墙和宫殿刚建成不久）。两者相距15米，呈南北向并列，紧邻一座数十年前建成的大型长陶窑（Y3），附近还有陶窑经营者的房子。当时，主祭者应该是先挖了一条数米长的浅坑，在坑中堆放柴草，点火敬神，等灰烬冷却后，再在坑底挖一个深且陡的小坑，然后往里面放置祭祀器物，最后则是用混合灰烬的泥土掩埋。

H6出土铜铸两件、铜刀一件、铜被一件、铜镶十件，都是武器和工具，没有酒器和食器；陶器则有鬲、罍、盆、壶、罐、大口尊和瓮等。

H7出土有铜爵、铜觚、铜鼻、铜戈、铜铸和铜刀，还有玉戈、玉柄形器以及石斧，但没有陶器。这些物品呈环形放置，沿坑壁还有三块石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界内藏有一块使用过的卜骨，上面

有钻好的圆窝和烧烫裂纹，很可能是用来占算这次祭祀的，所以被一起埋入了祭祀坑。

甲骨占卜是典型的中原-早商文化，在长江流域很少见，所以，和铸铜技术一样，应该也是商人带来的。不仅如此，来自北方的甲骨占卜还被南方的埋物祭祀仪式所吸收，这显然反映了南北、主客两种文化间的融合。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盘龙城外的杨家湾发现了另一座祭祀坑，编号H6（为与王家嘴H6区别，下文称为“杨家湾H6”），属于盘龙城文化七期（商文化晚期），大概在城池和宫殿体系建成后一百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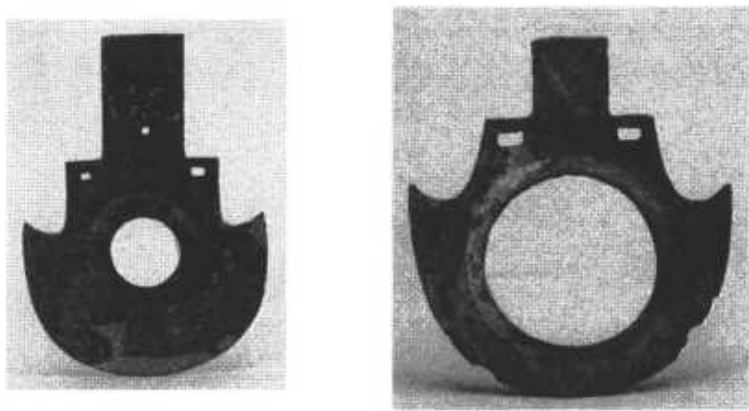
杨家湾H6位于三座房子和一大片灰烬地带之间，灰烬可能是冶铸铜器形成的，呈不规则方形，边长2米多，深64厘米，坑内填的是混合灰烬的黑灰土，坑底铺朱砂，有兽骨，应当是作为祭品的肉食。

埋藏的器物多达58件，主要是铜制酒器和食器（礼器）；其次是陶器、玉器和石器；坑口位置集中摆放的是铜兵器，有钺一件、矛一件、戈二件、链15件以及玉戈一件。其中，铜钺造型夸张，刃部呈半圆形，两刃角钩状上翘，钺身中部有一边缘较厚的大圆孔。这种铜钺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属于盘龙城最晚期发展出来的独特形制：美学功能增加，但实用性降低，难以深入地斩劈。杨家湾七期墓葬Mi1中，也有一件与此类似。

在这之前，盘龙城人还没有这种不实用的铜钺，比如，城池兴建阶段（四期）的李家嘴M2随葬的铜钺还是实用的商式特征。在商人文化中，钺是军事权的象征，也是杀俘献祭的重要工具。盘龙城人到晚期还在生产铜钺，说明他们的商文化血脉仍在延续，部族军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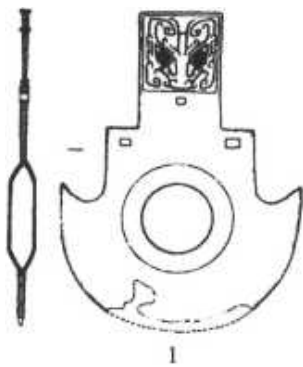
也一直存在。但是，晚期铜钺却变得不实用和卡通化，又说明他们已经很少杀戮人或牲畜。而把铜钺和各种兵器作为祭品埋入祭祀坑，则几乎是对商人杀祭宗教的一种讽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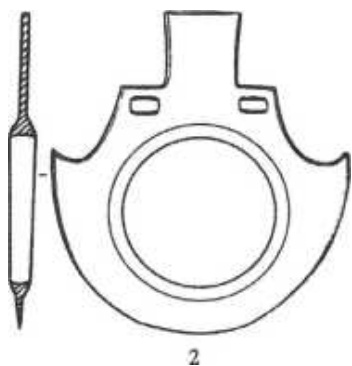
这三座祭祀坑是发掘报告确认的。此外，王家嘴遗址（地层不详）还发现了十多座密集的小坑，每座0.5平方米左右，里面埋有木炭黑灰、完整的陶缸或碎片以及很多盛放食物和酒的陶器。这些坑无法用于冶铸，所以也可能是祭祀场所。



杨家湾M11铜钺

杨家湾H6铜钺





10厘米

杨家湾盘龙城七期的卡通化铜钺

目前，盘龙城城外一共发掘四座埋藏物品的祭祀坑（场），数量似乎不大，但考虑城内和城外发掘的墓葬总量也不过30多座，这样算下来，平均不到十位死者就会有一座祭祀坑（场），而且每座祭祀坑内还会有多组器物，由此，盘龙城人的埋祭仪式之多和物资消耗之大就可见一斑了。

如前文所述，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距今8000年前）有将大量石器和陶器、玉器摆放在祭祀场并加以掩埋的现象，而考虑到北福地是石器制作工场，盘龙城是铜器冶炼场，它们之间很可能有类似的宗教逻辑：石器和铜矿石原料来自大地，将制成品埋入地下，是表达对大地的感恩；这也是一种“播种巫术”，把物品想象成种子，种子会在土壤中发芽成长，结出更多果实。

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很遥远，但两地之间仍有很多联系。比如，盘龙城发达的制陶工艺已输入郑州商城；约3400年前，郑州商城还出现了王室级别的埋葬青铜器的祭祀活动，而这很可能是盘龙城商人对“母邦”的影响，致使商王朝一度曾考虑放弃人祭宗教。

但商朝腹地旋即发生大动荡，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毁弃，继起的小双桥朝廷再次回归人祭宗教。这意味着商王朝内战的胜出者是盘龙城的对立面——盘龙城和王朝腹地的联系就此彻底断绝。

这之后，盘龙城（商人）又维持了数十年时间，而且和长江流域土著族群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最终，盘龙城消失了，青铜技术却在南土扩散开来。

青铜技术扩散江南

很难追索盘龙城消失的原因，也许是周边部族攻灭了它，也许是盘龙城人迁徙到了别处。长江流域一直很难出现权力集中的政权，哪怕北来的青铜技术和文字书写技术（虽然尚缺乏直接证据）输入后，也没有太明显的改观。

而在北方，殷墟时期的商朝实现了稳定和复兴，对铜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也拉动了长江中游的铜矿开采和冶炼行业。由此，南土的铜、锡原料便一直可以输往中原，同时，有些商朝高端青铜器也被贩运到长江流域。当然，虽然南北之间有贸易和技术上的交流，但殷商王朝此后再也没有尝试把统治触角伸向这里。

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都大量出土过商代后期（殷墟时期）的青铜器，有些出自窖藏，有些是随葬品，商代风格和本地元素杂糅，本地化特征普遍高于盘龙城：

一，江西新干大洋洲镇发掘的一座墓葬，随葬铜器多达480多件，比盘龙城的高等级墓葬要高十倍，其中，铜鼎有31件，铜戈28件，铜矛35件；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农具和工具，如犁铧、耒、耜、镬和镰刀等。在中原地区，青铜农具从未普及，但大洋洲却因靠近铜产地，铜价低廉，甚至奢侈到用青铜制作农具。到晚商，江西

的吴城还出现了夯土城池，很可能有盘龙城人辗转融入当地，但该城址缺少高等级宫殿和墓葬的信息，很难判断它作为早期国家的发达程度。

二，湖南零散出土过多件商代晚期青铜器，大都做工精良，造型奇异，著名的有四羊方尊和虎食人鼻。尤其是宁乡县张家坳出土的一件铜鼎，口内有“己丙”二字铭文，属于典型商族人的特征（天干铭文），说明殷商和湖南地区有密切联系。此外，该县还出土有人面方鼎以及兽面铜甗，铜甗内装着224件小铜斧。目前，在湖南发现的晚商铜器多是零星出土，应当是出于祭祀目的而埋的。¹⁰

三，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祭祀坑也有出土密集的青铜器，以及本地风格的青铜面具、神树和神人像，时代属于殷墟前期。但没有发现杀人祭祀现象，以及和王权有关的大型工程。这些都属于长江流域的宗教-社会传统。

盘龙城距离黄河边的商都郑州足有500公里，是早商王朝宏大扩张运动的产物。在350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达到这种规模的疆域。在今天，500公里不算太遥远，但要注意，盘龙城和郑州分属长江和黄河流域，并没有水路航运的便利，只有分水岭的阻隔。下一次再把这两地同时纳入统治范围，则要等到战国晚期的秦国，而那已经是一千余年之后了。

过度扩张给早商带来了荣耀，但更有隐患和教训。后来的商王逐渐开始考虑如何让商人免受异族文化的侵蚀，避免早商王朝的覆辙，而这奠定了晚商（殷商）时代的基调。

注释

-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分

为七期，一期到三期基本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夏朝时期，四期中段出现商人 拓殖现象，七期是商人拓殖时代的尾声。有关盘龙城考古的基本信息及图片， 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 2 由于长期的自然和人工破坏，现存的盘龙城城墙只有两米高三米高。另外，发掘

报告记载，有些地段墙基宽约20米，由此被有些文章转引为城墙宽20米， 这可能是不确切的，墙基和城墙的宽度可以有较大差距。

- 3 在F1北侧还有一座建筑的遗迹，被发掘者定名为F3,但建筑史学者杨鸿勋 认为，F3遗迹不是房屋建筑，而是带廊檐的围墙，并由此推断F1、F2两座 建筑都是被廊檐围墙包围的。复原图就是按照廊檐围墙院落绘制，但周围一 圈廊檐是否存在，还缺乏进一步证据。杨鸿勋：《盘龙城商方国宫殿建筑复 原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4 胥卫华：《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7期。

- 5 江西省文物局：《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

年1月19日。

- 6 张昌平：《关于盘龙城的性质》，《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 7 盘龙城产的青铜器上也是这种窄条形饕餮纹。
- 8 武汉市博物馆：《1997—1998年盘龙城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年第3

期；武汉市考古文物研究所：《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 9 张煜珠已经注意到，夏商时期的山川祭祀存在“南方用器、北方用牲”的差别。

张煜跳：《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不过这种差异开端的时间更早，它们也不一定只是对山川的祭祀。

10张煜跳：《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

第九章 3300年前的军营：台西

渡沱河从群山中流出，与黄河最下游的湿地融为一体。麋鹿在浅水草滩觅食，一旦受到惊吓，便会迅速藏身到芦苇荡中。

草莽和湿地中点缀着小小的农业聚落，农民住在狭窄的半地穴式窝棚里，种植谷子、豆类、麻和桑树，也捕鱼射鸟，采摘野果，用麻皮和桑蚕丝纺织衣物。按《禹贡》的说法，这里属于“鸟夷衣服”的蛮荒之地，但进入王朝时代后，也开始出现显贵的统治者。

在石家庄市东郊藁城县的台西村有一处商代遗址，是海沱河的冲积平原，有三座土丘高出地面数米，长约百余米，可以暂避周期性泛滥的洪水。土丘之上遍布商代遗迹，1973—1974年，考古队在其中的“西台”周边发掘了一批房屋和墓葬，就此，一个商代小型聚落逐渐被揭开了部分尘封的面纱。

在诸多商代考古遗址中，台西的规模很小，“知名度”也不算高，但它是商王朝权力体系最末梢的完整个案。可以说，关于商王朝如何统治幅员上千里的辽阔疆域，台西是最难得的缩影。】

屋檐下的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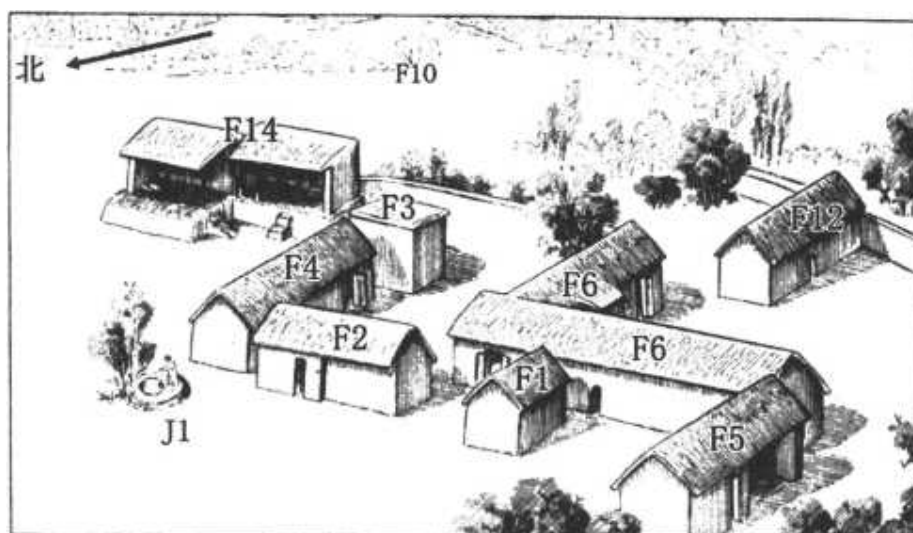
发掘显示，最早在台西生活的是贫穷农夫，他们住在狭小的半地穴式窝棚里，使用石头和骨头做的农具，在地上挖掘不大的窖穴储存粮食，用粗糙的夹砂陶器烹煮食物。这种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场景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然后，一群使用青铜武器的外来者占据了台地，建立了对周边农业聚落的领导权。没有发掘到他们住的房子，但在西台土丘边挖到了他们的家族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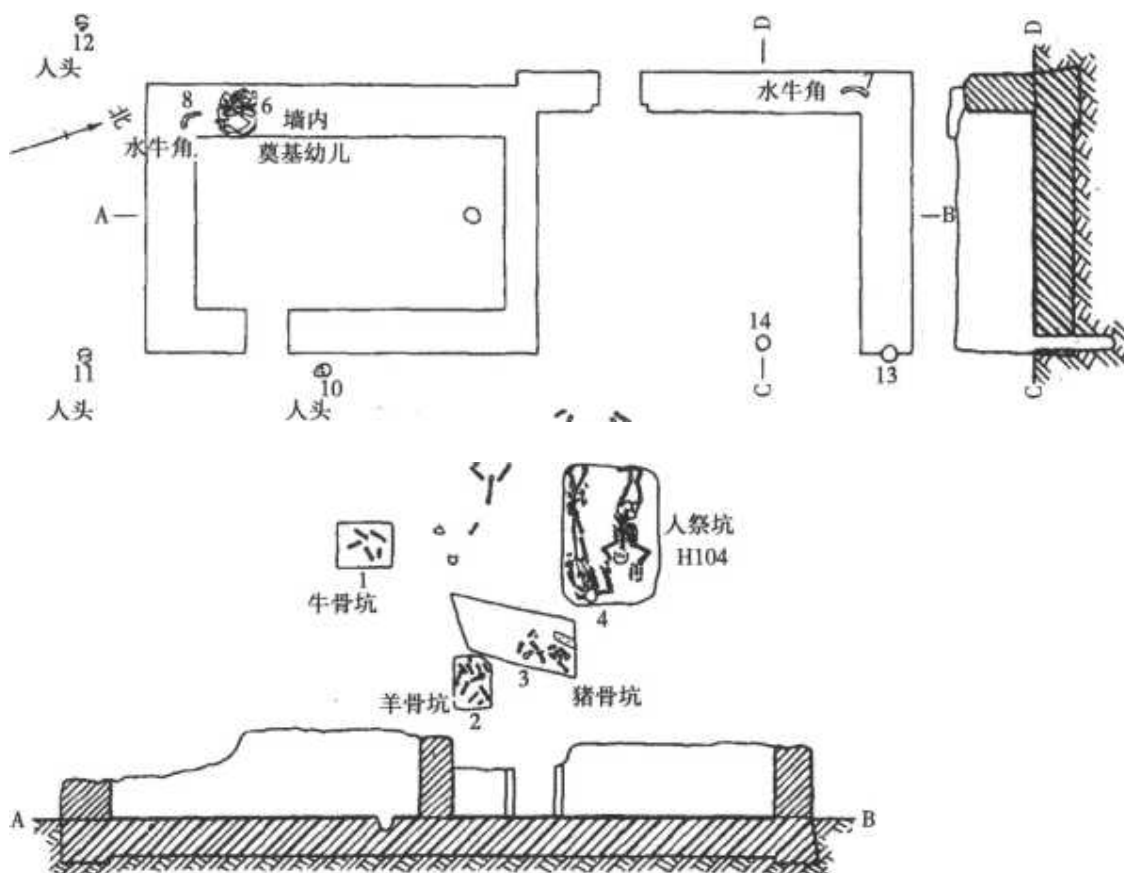
这是3300年前，商王朝已经建立近三百年。此前，商朝的统治中心一直在黄河之南，直到商王盘庚把王都迁到黄河北岸的殷地。迁都后，王朝需要调整防御圈，特别是要加强对蛮荒北方的防御，于是，一批批商人部族从殷都迁往北土，沿着太行山建立军事聚落。

来到石家庄台西的这几十名武士以及他们的家眷和仆从，要王朝守卫海沱河南岸——新营建的殷都在南偏西方八百里外。这是一个和盘龙城完全不同的据点，更接近商王朝的常态。

这群武士在台西立足数十年，第三代人已经出世。之后，源沱河的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一切，包括武士和农夫们的房屋，地势较高的墓区还淤积了一层厚厚的细土，夹杂着河蚌和田螺。



人头



Q.....! 2 米

F2基址平面图

当洪水褪去，武士们需要建设新居。这次他们把房址定在了西台边的高地。这里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墓地，不过现实的需求更重要，更何况，墓地已被覆盖在淤积的泥土之下。

发掘显示，青铜武士们认真考察了西台周边的地势，先是用白石粉划出新居墙壁的轮廓，接着平整土地，开挖基槽，夯筑起半米多厚的土墙，墙体用土坯垒砌，高2米以上（当地简陋的版筑技术

似乎 不支持筑太高），然后在土墙之上安放木头椽条和椽子，铺垫芦苇束，抹草拌泥，屋顶就宣告建成了。

到这里，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但考古发掘揭开了惊悚的一幕。

一座两间连体的房子（F2）西墙的基槽里，埋着一件陶罐，里面 是一具不满三岁的幼儿尸骨。显然，这是给新房奠基的巫术，用幼儿 向土地之神献祭，以保佑家宅平安。献祭的死者不止幼儿，朝东的屋 前还有四座祭祀坑，其中三座各埋入一只猪、牛、羊，第四座坑（H104） 埋的则是人。

H104的边长2米左右，方形，深约1.5米，底部埋有三人。一 名十四岁的少年可能先被杀死，被扔在坑角；然后是两名成年男子，被捆住两腿扔进坑内，胳膊呈挣扎状，但尸骨并不在坑底部，而是弯 曲在从20厘米到120厘米高的曲面上，说明当献祭者向坑内填土时，两名男子曾努力从土中蠕动钻出，直到力气耗尽，才被活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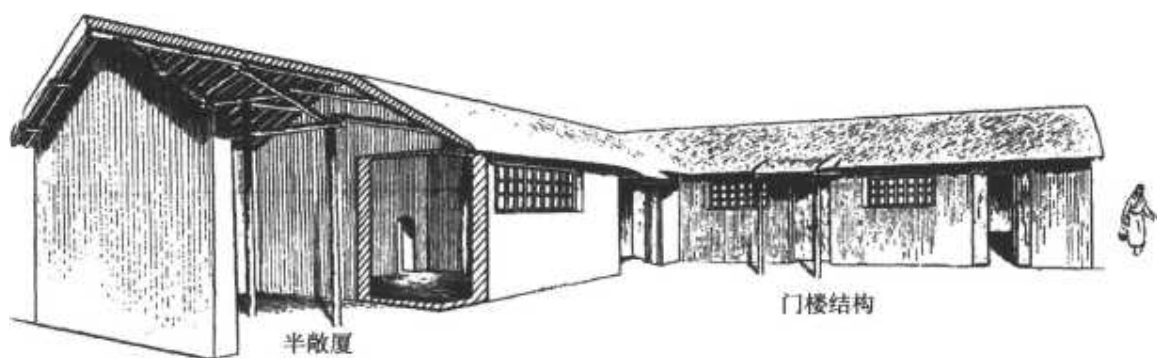
从骨架姿势看，他们都是捆绑后被推入坑中活埋的。南侧的男子， 三十五岁左右，两脚被捆，两手撑地，头仰起，呈挣扎反抗状；北侧 的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两脚亦被捆绑，头朝下，两臂张开，亦呈挣 扎反抗状。两具骨架几乎平行，可能是同时被推下坑的。

这座房子还有更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废弃后塌落的土坯中混杂着 四枚人头骨，分别散落在东、西、南三面墙外。这些头骨没有被夯筑 在土墙中，也没有埋在室内，这就只剩下一可能性：它们被挂在室 外的屋檐之下，最后随着房子的坍塌而被掩埋。

在其他的商代遗址中，人祭和人奠基很常见，但都没有发现房屋上悬挂人头的。这也可能是因为多数遗址的保存情况并不好，加之后人的耕作破坏，只剩下了房屋的地基和墙基，难以发现地面以上建筑的各种现象。人祭坑和人奠基因为埋在地下，所以能一直保存到现代。

而台西遗址不同，房屋坍塌后，废墟被掩埋而变成了当地土台的一部分，没有发生后期破坏：有些房屋残墙甚至还保留着两三米的高度，墙体上开的风窗亦清晰可见。

台西的地下埋藏和各地已知的商文化遗址很相似，如人奠基、人祭和人殉，但其保留在古地表之上的建筑遗迹却给我们补上了难得的



F6复原图

一课：原来与人祭有关的不仅是墓葬和祭祀坑，还有地上的展示。

那么，台西的房屋废墟为何能被完整掩埋，是风吹来的沙尘堆积，还是洪水泛滥造成的淤积？对此，发掘报告没有提及。

从祭祀坑和悬挂的人头来看，F2可能是座神庙：北屋有一面没有墙，是敞厦，适合安放某些被崇拜和献祭之物；有一面对着四座祭祀坑，被几座房子从三面围成一个小院落，应当有某种特殊地位。

屋檐下悬挂人头的不止F2，紧挨着的F6亦是如此：F6由两间北屋和四间西屋构成，西墙内夯筑了一颗人头，是一名大约十八岁的女性的；在房子坍塌的泥土中散落着五枚人头骨，之前应当也是悬挂在屋檐之下的。

F6并不像是神庙，似乎是权力中心。它有五间互不联通的独立单间，以及一间单面无墙的半敞厦，四个房门两侧都有安放木柱的洞，发掘报告推测，这些柱子支撑的可能是某种“门楼”式的装饰结构。而那些散落的人头，当初可能就悬挂在门楼上。

那么，居住在这些房子里的是什么人？坍塌的房屋内并没有发掘出太多文物，无法提供答案，但主人的坟墓就在房子周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朦胧的青铜武士群像。

青铜武士群像

台西遗址共发掘112座商墓，随葬青铜器的只有18座，平均每座埋铜器五件，说明贵族统治者在本聚落人口中只占少数。有11座使用了殉人，殉二人的有两座，其余的殉一人，共殉13人。

贵族墓葬大多有青铜兵器，如钺、戈、戟、矛、刀、镞等，有圆形的青铜泡，可能是缀在牛皮铠甲上面的，但皮甲本身已经腐朽无存。还有成套的青铜酒器，如肆、觚、爵等。稍有身份的商人都会用一套青铜酒器殉葬，只不过多数质地粗糙。可能这个据点太小

且资源贫乏， 贵族们的家境不算豪奢， 只好专门采购成本低廉的随葬铜器， 兼顾阶 级礼俗的面子与生活的里子。

台西的商墓也多有“腰坑殉狗”。这里食用狗肉的风气更盛，随葬的食器中多数盛有狗肉， 主要是狗头和狗腿。更体面的墓葬有殉人， 男主女殉、男主男殉和女主男殉的都有， 但没发现超过两名殉人的墓， 毕竟， 武士们的经济不太宽裕。

下面， 我们来看几位典型的墓主。

M17， 一名早夭的武士。这座墓穴比较简单， 没有二层台和殉人， 只在腰坑殉了一条狗。墓主是名大约二十二岁的男子， 头部和胸部的 骨骼大都腐朽。随葬的用具只有一只陶鬲， 其他都是兵器：铜钺四枚， 铜匕首、铜凿、铜戈和铜戟（矛和戈的合体）各一件。

难得的是， 铜戈和铜戟都带着木柄， 虽然已经腐朽， 但通过痕迹 测量， 戟80厘米长， 戈87厘米长， 都是短柄徒步作战兵器。台西遗址没有发现马车遗存， 还处在徒步作战时代。墓中还有玉质石头磨制 的钺和斧各一把， 没有使用痕迹， 属于专门随葬用的。

从随葬品看， M17的墓主属于贵族统治阶层， 父亲可能是拥有铜钺的军事头领， 但这位墓主青年早逝， 还没来得及分家独立， 所以 没有属于自己的奴婢随葬。除了本人拥有的兵器， 父亲没舍得给他随



M14随葬的旗牙铜钺

葬太值钱的物品，但用了一枚石钺，象征死者本可能继承父亲的铜钺 和军事头领身份。

M14，一名四十五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军事贵族、巫医兼占卜师， 身高约1.7米，骨骼粗壮，葬在一具黑漆底、红色绘图的棺木中，棺 木已经朽烂。

二层台上殉葬了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身高接近1.5米，可能是被捆绑住手脚活埋的，还保持着张嘴呼喊的姿势。除了一支束发用的朴素无纹饰的骨笄，没有其他的首饰和饰物。

此外，二层台上还摆放着主人的随葬品：一件贴着金箔的漆盒； 作为体面商人必不可少的青铜酒器组合；两件实用的煮饭炊器

（陶鬲）；一把青铜大刀，连柄长约半米，刃部宽阔，刀头上翘，适合劈砍而不是刺杀；几件铜镢和一件獠牙纹饰大铜钺。

特殊的是右边的二层台上，有三片牛肩胛骨加工成的卜骨，上面凿好了占卜用的坑窝，没有刻写文字。还有小铜锯和铜凿，可能是修整牛骨的工具。

墓主左脚边有一件漆盒，里面放着一把手掌长的石头镰刀，考古学家推测，这不是农具，而是一种医用手术刀——石硬镰。古代战场上最常见的是箭伤，多数箭矢有倒钩，深陷在皮肉之中难以拔出，需要用硬镰先割开伤口，小心拔出箭头。另一种是被钝器击伤后的淤血，穿皮甲的战士常有这种伤，也要用硬镰划开皮肤，将淤血挤出来。可能古人不习惯青铜手术刀，觉得铜性恶，容易引起坏血，古老的石头工具反倒更有亲和力。

从卜骨和石硬镰看，台西M14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占卜师兼军医。上古时代，这两种身份经常重合，被称为“巫医”。但这还不是他的正式身份，因为他有一件大铜钺，钺身长30多厘米，在台西遗址出土的铜钺和玉石钺中，尺寸最大。

钺是军事首长的身份标志，也是献祭时砍头的工具。商代铜钺的刃部，多数并不左右对称，但砍杀时更便于用力。M14主人的铜钺形制威猛，钺体用朱红色装饰，造型酷似张开血盆大口的兽头，嘴里还有一对尖利的獠牙。



M103墓穴照片

在台西墓葬中，还有一座随葬三片牛肩胛骨的M103。墓主高约1.7米，用了两名矮小的男仆殉葬，其中一名是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双腿在膝盖以下被砍去，似乎生前就已经残疾。在甲骨文中，砍掉小腿是“刖”：对那些有可能逃跑的奴隶，砍掉小腿是最好的预防手段，但死亡率也高。据殷墟卜辞，商王会一次对多名奴隶（仆）实施刖，还要卜问在哪天砍腿的死亡率会比较低。

上古时代，用甲骨占卜是一种高深的技术，往往在家族内部传承。如果台西的占卜技术也是如此，M103的墓主很可能是M17的父亲，因为M103下葬要早一些，在发生大洪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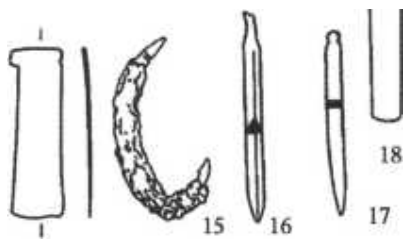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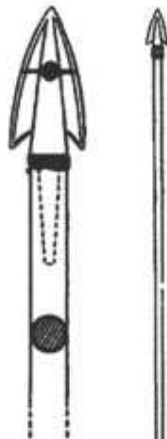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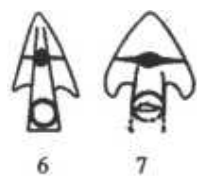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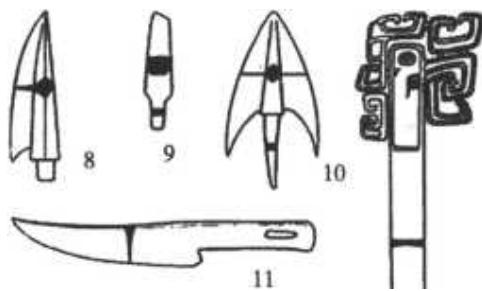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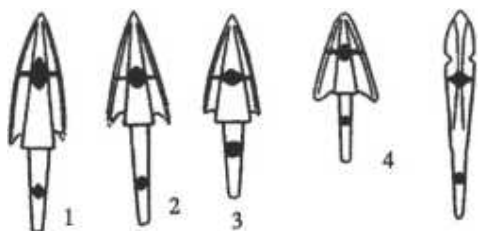
M38，一名饮酒习兵的少妇，三十岁左右，身高约1.5米，葬在黑漆棺材中，向右侧卧，面向二层台的殉人。这名女墓主没有戴束发的笄，可能披散着头发。殉人是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比墓主矮，也有自己的小棺材。

墓主的棺材中随葬了几件铜器：酒器有铜甗和铜爵各一件，但缺少铜肆，无法构成完整的“三件套”。随葬铜器用丝织品包裹着，其中还有一种特制皱纹绢——“穀”。兵器有铜钺和铜戈各一件，戈刃纤巧，长约22厘米，最宽处约5厘米。这在台西遗址乃至在整个商周青铜时代，都算是比较短小的，有可能是为女性武士特制的兵器。

商代女性贵族普遍饮酒，甚至参加战争。和台西遗址基本同时，殷墟妇好的墓葬也随葬了大量酒器和兵器，并且，甲骨文中还有妇好带领军队远征的记载。

这名女武士应该是一位妻子和母亲，丈夫也是台西青铜武士，但死后都是单独埋葬，各自拥有自己的殉葬奴仆。

从墓葬可见，台西聚落青铜武士属于低级贵族，普遍拥有男女奴婢，用来殉葬的只是他们拥有奴婢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武士们都随葬有兵器和酒器，但没有农业生产工具，显然，他们不事生产，靠从周边村落征收粮食和各种产品生活。墓中的武士，各年龄段都有，还有武装的女性，他们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这种家族血缘单位构成商朝最基本的军事和政治单元。



台西出土箭镞及复原图

台西发现的青铜箭镞数量很多，而且造型各异，明显不属同一批次铸造。台西本地没有发现铸铜作坊，武士们的铜镞等兵器应当是购买的，且来源比较广。很多商人族邑都有铸铜作坊，铜镞是最常见的产品，可见当时商人聚落之间的铜器贸易应该比较活跃。

在台西墓葬区还发现了一支完整的羽箭，全长85厘米，杆已腐朽，但遗留的痕迹明显，可能是某种藤条制成，尾羽已经完全消失，发掘者绘制复原图时，参考后世文献增加了尾羽。

宿舍与伙房

住宅区的复原图可以提供一些武士们的生活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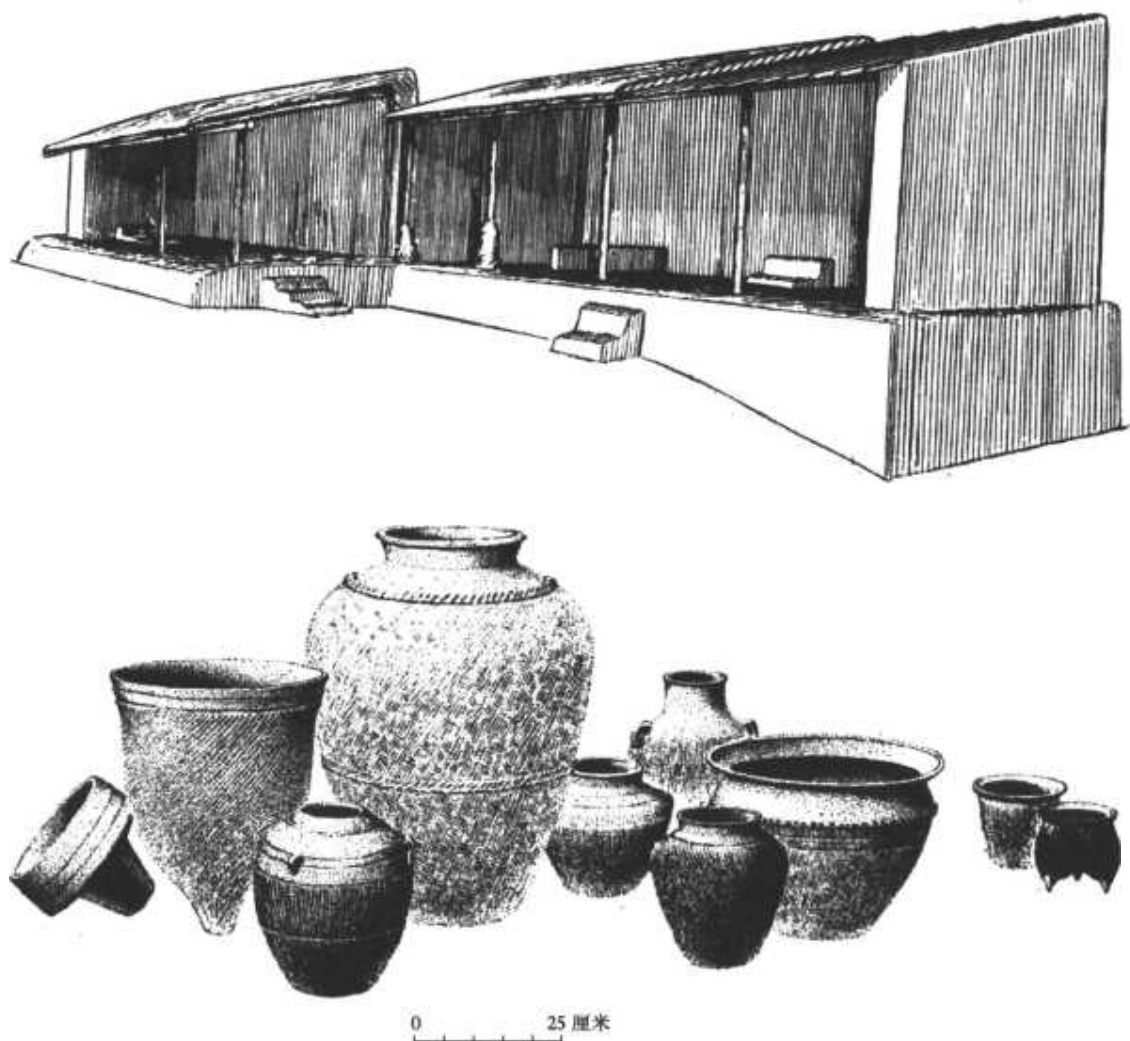
发掘出的住宅区有连片的房屋七组，二十余间，所有的房间都有单独朝外的门，内部互不相连，开门的方向也不一致，一座房子的两个房间，可能一个向东开门，一个向西开门。总的来说，这片住宅区更像一组“单身宿舍”。

这些房子并不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家宅，因为几乎所有房间都没有做饭的陶鬲等炊器，也没有炉灶火塘（炉灶的烧土和炭灰本是最容易保存下来的），只在住宅区最北边有两间“公共伙房”。

所以，这片住宅区可能是某种军营性质的公共建筑，供武士们定期在这里住宿和值班。他们应当另有私家住宅来安顿老人、妻儿

以及 奴婢和牲畜。几乎所有的青铜武士墓葬都随葬有做饭的陶鬲或铜鼎， 这说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但目前尚未发掘到他们的私宅。从军 营宿舍的规模判断，他们的家宅也不会太豪华，可能也是数十平方米 的夯土房屋。

来看两间编号F14的“公共伙房”：两间敞厦式房屋，南室靠墙



F14房屋（伙房）复原图及部分陶器

是炉灶，木柱下半截用草拌泥包裹，以防止被炉火引燃。

两间伙房出土有大量陶制炊器，从大型盆罐，到小型的鬲、豆。其中一件大罐内有重达W斤的“灰白色水锈状沉淀物”，经化验，是制作黄酒的酵母。看来，伙房也兼作酿酒作坊。另外，出土器物中还有陶制的漏斗形器，应是灌酒之用。

伙房的几件大陶罐内，储存着很多干果，有李子和桃子的果仁、枣子以及大麻和草木樨的种子，有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用来炮制有治疗疾病作用的药酒的。

华北亚热带时光

台西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是鹿角制作的工具，其中麋鹿多于鹿。从生活习性看，麋鹿主要生活在湿热地带的沼泽，麀鹿则主要在较干旱的草地和稀疏林地，这说明当时台西地区以沼泽湿地为主，间有部分干旱草地和树林。

如前文所述，在商族人崛起和建立商朝的过程中，水牛一直伴随着他们，甚至当青铜武士来到遥远的北土建立军事据点时，还驱赶着这种熟悉的家畜。台西遗址的房屋和墓葬中大都出土过水牛角。比如，西台东侧的一座祭祀坑H50，就埋有一具完整的水牛骨架；M102也随葬有一对水牛角，以及羊肩胛骨和猪腿，用来代表猪、牛、羊“三牲”；F2东墙的南北两端，也各夯筑了一只水牛角。

在商人的传说中，先祖王亥曾经赶着水牛群到河北有易氏之地（台西遗址以北250公里处）。但另一种重要的家畜——马，却在台西遗址难寻踪迹，只在像是指挥中心的F6西门外的垃圾坑H3中发掘出一根马的肋骨。它可能是作为食物吃剩的。2马和马拉战车在

中国出现得比较晚，到商代后期才普及。和台西同时的殷都虽已有马车，但台西聚落级别较低，应该还没有。

此外，M112的随葬品中有铁刃铜钺和铜甗各一件。铜钺较小，接近成年人的手掌，主体为青铜，刃部是铁质，已经失落，但断口处还保留了较多铁质。为什么用这把没有刃部的钺随葬，毕竟碳化的铁远比青铜坚硬和锋利？这不好解释。可能是铁刃过于珍贵，后人敲了下来继续使用，只用青铜钺体给先人随葬。铜甗则比较精致，做工比台西其他墓葬中的铜器都要好。看来，这位墓主是台西最富裕的人物。这座墓是1972年农民取土时挖出的，没有经过专业发掘，只知道墓葬有殉人，很多信息已经无法复原。

曾有学者认为，商代还没有冶铁和锻铁技术，这把铜钺的铁刃应



H50祭祀坑中的水牛骨架

该是陨铁。但也有学者从其所含的微量元素推测，这不是陨铁，而是 人工制作的熟铁。在“伙房” F14前面，出土有一些冶炼过的残铁渣 和两小块铁矿石，显示台西人也许已经掌握初步的炼铁技术。但因为 没有发掘到冶铁和锻铁的工作区与产品，目前还无法确定。

台西遗址并非只有青铜武士，还有普通农民。发掘虽集中在“贵 族营区” 极为有限的空间，但还是在最边缘处挖出了一座穷人的房基， 这便是F10。

F10在武士营房后面十几米处，东西长2.6米，南北宽1.6米，室内只有4平方米的空间，极为狭窄局促。它的建筑方法是，先在地上挖出半米深的半地穴，形成居室的轮廓，然后加盖草木窝棚。

室内屋角有一直径和深均50厘米的圆形储物坑，里面有做饭的陶鬲和残破的石质农具。储物坑的旁边是灶坑，有烧土和灰烬，“除 去藏穴和灶坑以外，仅能容两人栖息。这种简陋的房屋，自然与居 住者社会地位的低下有关”。这是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极为常见的 农舍。

农民的墓葬散布在青铜武士营区周围，大多没有随葬品，或只有一两件粗糙的陶器。台西目前发掘112座大小墓葬，“人架除完整的 和腐朽成粉的以外，还有10座墓人架的股骨或胫骨全部或一半被截 去。其中有的截面上有刀砍或锯的痕迹，似乎是受过刖刑”。

被砍掉腿的人数占墓葬总数的近十分之一，考虑到有些墓葬尸骨 已完全腐朽，无法观察和统计，实际比例应当更高。这也是青铜武士 统治农民的方式之一。

台西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用石头和骨头磨制的箭头（镞），有些是底层农民的捕猎工具，有些则属于青铜武士。这些贵族一般只用三四枚青铜镞随葬，看来再多就负担不起了。

台西遗址没有留下文字，青铜器上也没有族徽铭文，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台西商人氏族的名称，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驻防的这片土地。商人把定居点叫作邑，台西遗址则是一座湮没在历史中的无名之邑：它只是一座规格不太高的军事聚落，主人也只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地方军事贵族，在他和安阳殷都的商王之间，应该还隔着至少一个指挥层级。

虽然距离殷都有些远，但台西商人并不孤立，他们使用的铜器和殷都完全同步，属于典型的殷都初期风格，礼器的花纹繁多，几乎遍布全身，而早商郑州和盘龙城的铜礼器大多只有一条纹饰窄带。这说明台西商人和都城的联系很密切，商王朝也比较重视这些北方边疆的守卫者。

这座军事营地后来被废弃了。发掘显示，部分房屋毁于火灾，比如最大的连体建筑F6。但这并不意味着营地被废弃全因火灾，即使被火焚毁，重建也不是难事，况且这座营房本就是在火灾之后重建起来的。

被废弃的真正原因，应该是青铜武士们移防了。在盘庚迁都之后，商朝对黄河北岸的统治日渐稳固，边防线也就逐渐向北推移。到殷墟后期，北方防线已经推进到今河北定州（距离台西遗址约80公里），甚至更北。

或许，部分房屋的焚毁被台西首领解读为神降的启示，故而放弃旧居，继续向北迁徙。在青铜武士匆匆离去时，有些笨重物品被

放弃，比如公共伙房内几个装着酿酒原料的大陶罐。对于周围的农民而言，军营里遗留的物品颇有价值，看来他们并没有进入这座悬挂着人头的营地，于是，房子在年久失修中陆续坍塌，最后被掩埋了起来。

与此同时，殷商王朝正在走向中兴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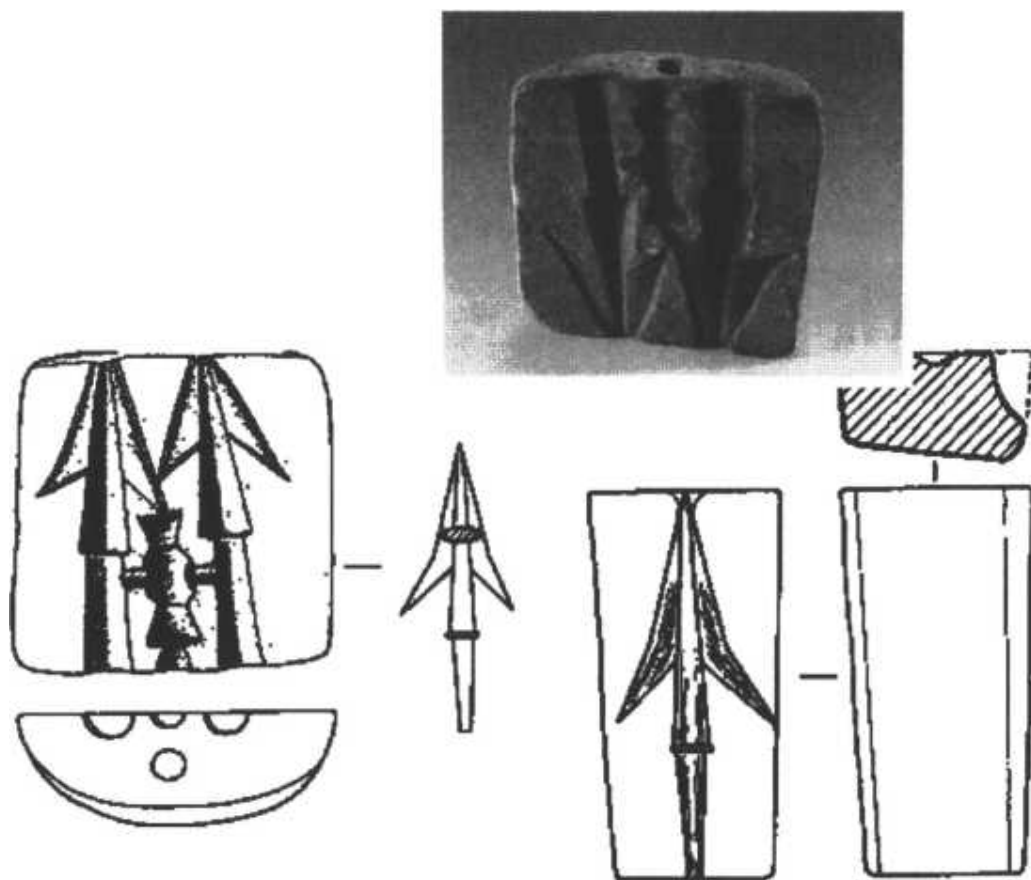
附录：北土食人部落

在燕山南麓，有一个经常吃人的聚落，这便是今北京昌平区的张营遗址。³

在相当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张营聚落已经存在，但那个阶段的遗迹很少。到了早商后期（张营遗址三期，二里冈文化后期），张营出现了一些商族风格的陶器，比如所谓“瘪裆”造型的陶鬲，但仍以本地陶器为主流。

新的改变是铜器制造。张营遗址发掘出的石头和陶制的铸铜范皆为制作小件铜器的双面范，如跳、针、锥、鱼钩和小刀。此外，还有铜制的耳环、凿、鱼镖和梳子。有炼铜的铜渣出土，说明本地用铜矿石冶铸。但没有发现任何铜容器的铸范和实物，也没有铜戈、铜矛和铜钺等兵器。检测发现，多数铜器是铜锡合金，基本没有铅，但这种合金硬度较高，只适合制作小件铜器。可能张营人的铜器以自用为主，外销较少。

张营聚落只发现几座很小的房屋遗址，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仍处在部落生活阶段。截至目前，发掘122座灰坑（垃圾坑），其中，



两件铸造箭微的石范：分别只能铸造一枚和两枚箭微。西安老牛坡二期发现的陶范 一次至少能铸造五枚箭镰，郑州商城的陶范一次能铸造十几枚，张营聚落规模较小， 铜器产量也低得多

有12座埋有零碎的和残破的人骨，4跟猪、牛、羊、鹿的骨头混杂在 一起，没有完整骨架或肢体，头骨也都被砸开。

有些人骨制成的工具，主要是用股骨（大腿骨）制作的骨锥，它 们应该用坏之后被扔进垃圾坑的。此外，在F1中还发现一块人股骨， 可能也是制作工具用的。

在发现的60块人骨中，只有两块属于夏末商初（张营二期），其 余属于商代中前期（张营三期）。发掘报告推测，灰坑H84中的

人骨 至少来自七个人，H105至少来自两个人。人骨过于零碎，多数无法 鉴定年龄和性别，只有几枚牙齿属于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有些骨头，特别是股骨上，有敲砸和刀砍断痕，可能是敲骨吸髓 所致。约一半骨头被烧过，应是烧烤食用。发掘报告推测，当时这里 应该存在食人风俗，战俘或奴隶可能会被杀死后肢解分食。

三期（商代中前期）的张营人虽然能够冶铸铜器，但还无法完全 取代石器。发掘出的最主要的农具和工具都是石头做的：石斧32件， 石铲13件，石镰56件，石刀23件，石饼10件，石镞10件，石磨盘11件，石磨棒14件。除了饲养家畜，狩猎占的比重也比较大，灰坑中有较多鹿类的骨头，还有虎、豹、棕熊、马、驴等。

那么，在张营人势力最盛、食人行为最多的三期，他们和商朝是 什么关系？

这个阶段，早商王朝的扩张正达到顶点，但张营聚落到郑州商城 的路程超过750公里，比湖北盘龙城还要远二分之一，所以很难断言 早商王朝的势力能直接控制这里。不过，冶铸铜技术和商式陶器显示， 张营人明显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张营人的食人风习应该是自身固有的传统，和商族关系不大，但 新传来的铸铜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击败周边部族，使得食用人骨 的数量大增。这是一个被技术改变过的人群，但终究没有扩张成为早 期国家。看来张营人比较安于部落生活，后来又迁移到了别处，消失 在三千多年前的迷雾中。

对于蛮荒的上古时代，我们现代人能理解的实在很少。

注释

-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下有关

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和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 2 一同出土的有猪的下颚骨，以及一具老年妇女的零散骨骼：人头和一条腿已经脱离身体。她大概是一名为军营服劳役的土著农妇，可能因触怒某位青铜武士而被砍成数段，然后被扔进了垃圾坑中。
-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昌平张营》，文物出版社，2007年。有关该遗址的基本

信息和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 4 这些含人骨的灰坑编号是：29、33、62、70、78、83、84、99、103、105、106、107。

第十章殷都王室的人祭

小双桥遗址代表的“中商”不算长，可能不足百年，有残酷的人祭仪式，有巨大夯土台“周勃墓”，但商朝总体仍呈现衰微不振的迹象。直到从第十九王盘庚迁都殷地，这才算走出中商的低迷。

商王朝前后存续五六百年，殷商大约占了后一半，约两个半世纪，因此学界也称之为“晚商”。殷墟考古比较丰富，出土有大量的商王占卜刻字甲骨，发掘了王宫、王陵和多处商人的族邑及墓地，有属于王族的，也有普通商人族邑社区的。

殷墟保留的人祭活动的数量和种类最多，本章主要介绍殷都王族的生活区和人祭场：王宫（宗庙）区和王陵区。

盘庚王的训诫

后世的迁都往往只是换一座都城，对全国的影响一般不太大；但在国族一体的上古时代，国都是统治者族群最集中的地方，除了那些

散布在远方的零星据点，整个统治族群，或者说国家和王朝，都要整体搬走，不仅是王宫，还有所有的商族部落和家支，以及他们的牲畜、家奴。所以，迁都动议充满争论，多数商人并不愿搬迁。

这正是盘庚王当时面临的困境。

儒家经书《尚书》有若干篇历代商王的讲话记录，虽然难免有后人的改编和再创作，但仍有个别篇章基本保存了原貌。其中，最可信，篇幅也较长的是《盘庚》：在这篇讲话中，商人的精神气质和世界观体现得颇为充分。

在商人的观念里，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所以为了推动迁都，盘庚的讲话所表达的神权理念非常直白，充满着恐吓和威胁，不仅距离儒家描述的古圣先贤实在太远，也突破了后人对上古时代的想象力。¹

《盘庚》的行文古奥、艰涩，这是商人的语言特色。但它用的毕竟是和后世一脉相承的文字，就像是听某种汉语方言的谈话，我们还是能基本判断其大意的。

《盘庚》记录了盘庚王的三次迁都讲话，第一次在搬迁之前，后两次是迁徙到新都之后。

第一次，盘庚把贵族召集到王宫庭院做了一番长篇演讲，大意是，迁都之议不容更改，必须执行。讲话一开场，盘庚就引用祖先的权威说，是先王奠定了今天的王朝，如今，商朝不幸遭遇大灾，先王却没有出手相救，正是想让我们离开此地。如果你们心怀不满，不服从我的搬迁命令，我家先王会从天上给你们降下惩罚，他们会说：“为什么敢不服从朕的幼孙！”一旦先王们不开心，从天上惩罚你们，你们就不会有好下场！

……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

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

按照商人的宗教观念，历代商王死后会升到天上陪伴上帝，一直监护和保佑着自己的子孙，也就是后代商王，并随时对人间降下福佑或者灾祸。按照同样的逻辑，贵族死后也会进入天界，有一点点干预人间的能力，自然也要保佑自己的后代。人间的分歧，似乎由此将发展成天界争端。面对这个悖论，盘庚必须强调神界的规则：天界的贵

族们必须服从诸位先王，不能偏袒自己的子孙；倘若现世的贵族违逆商王，你们的先祖自会大义灭亲。

盘庚说，“当年，我家先王接纳了你们先祖的投靠，所以到今天，你们才能做我（像牲畜一样）养活着的人民。你们心里有恶，会遭到刑罚和杀戮，我先王会（在天界）追究你们的先人，所以你们先人不会出手相救，只会抛弃你们，看着你们死掉！”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盘庚继续说，现在，那些负责祭祀的人员已经准备好了祭品（贝和玉），“你们的先祖（跟着先王享受了我的祭品）就会告诉我家先王：‘快给我孙子降下刑罚吧！’我家先王就会给你们降下不祥之灾！”

兹予有乱（司）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但在先王降罚之前，盘庚还要动用现世的刑罚杀戮。他用了生活中的事例来警告那些不安心搬迁的人：“你们思想顽固，不体谅我的苦衷，还试图改变我的想法，都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和痛苦。就像大家要坐船过河，就你不愿意，在船里继续捣乱，不安好心，那我就只好把你扔到水里去。你不好好反思，自己生气又有什么用？”

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摩？

最后，盘庚恩威并施，用诱导和威胁结束了第一次讲话：“呜呼！如今我跟你们说的，都不要忘了。永远感念我的大恩吧，别做自绝于我的事情。你们只要在自己心里找到公平，就能懂我的道理，老老实实服从。再有不安心、不听话的，想搞点为非作歹的坏事，我会切掉你们的鼻子，然后再杀掉你们全家，一个不留，那样的话，新都城里就没有你们的子孙后人了！去吧，你们这些活人！现在我就要让你们搬迁，给你们建个长久的家！”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完，我乃鼻J、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迁都大业终于完成。后面两次讲话都发生在新都城，因为意见分歧已经不太严重，所以盘庚发出的威胁少了，鼓动更多一些。他还是拿“上帝”当自己迁都的理由：“你们说我「何苦震动万民搞搬迁？」这并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上帝要回报我家高祖的好心，帮我家振兴起来。朕只能虔诚地服从，老实承担你们万民的命运，在新都城永远安家。”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司）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在讲话中，盘庚还特别提到了受上帝重视的“高祖”：“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在后世商王的卜辞中，“高祖”一般是指王亥。可能因为王亥曾首次带商族北渡黄河，而盘庚王这次也是向黄河北迁都，所以会重点受到高祖王亥的福佑。

从《盘庚》讲话来看，商王的权威来自天界的上帝，但商王并不和上帝直接沟通，而是由列祖列宗代表上帝干预人间。面聆盘庚讲话的，应该都是商朝高级贵族，但盘庚对他们并没有太尊重的称呼，直呼其为“民”“汝万民”“我民”，还有“众”“汝众”“尔众”。至于王和这些高级“民”的关系，则是畜牧的畜——“汝共作我畜民”，“奉畜汝众”——动辄以杀戮和神灵的惩罚相威胁，少有温情，刻薄寡恩。

王还称贵族们为“生生”，直译为“活人”。这也是个提示：生杀予夺的权力在王手里，所以任何人活着都是王的恩赐，再高级的贵族也不例外。

两百多年后，商朝灭亡，当周公旦提出搬迁殷都的要求时，他也将和盘庚王一样，对殷商贵族发布一番动员讲话。而殷都的诞生与毁灭，就在盘庚和周公的这两次讲话之间。

疽北商城半途而废

盘庚从哪里搬迁，目的地又是哪里？《史记·殷本纪》说是从黄河北迁到了河南：“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而事实正好相反，根据现代考古，实是从郑州小双桥迁到安阳殷墟（殷都）。

殷都地处古黄河西北侧，太行山东麓的平原。阻水从太行山流出，向东注入古黄河，而渔水两岸就是殷地。在殷墟甲骨卜辞里，曾出现“殷”的地名，写作“衣”字形是一件宽领长袍，属于音近的借字；不过它更常见的名称是“大邑商”，在甲骨文中，“大”和“天”通用，所以也被释读成“天邑商”。商族人管自己的都城叫“商”，不管搬迁到何地，这个地名会一直随行。

至于盘庚为何要迁到黄河北的殷地，史书和考古都没有提供解答。《尚书·盘庚》曾提及商人在昔日的都城遭遇过一些困难，不够安定。不过，从考古看，小双桥时期的中商虽然称不上宏大，但并没有什么势力能威胁它，特别是在小双桥的西方与南方，并不存在强大的族群，所以难以解释盘庚为何向东北方向迁徙。

小双桥都邑有一些来自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元素，这似乎标志着小双桥朝廷和东方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按理盘庚应迁往山东。但事实却又相反，之后的甲骨卜辞显示，山东地区的土著（东夷）和商朝的关系并不算好。看来，融入小双桥的岳石文化因素并不代表商朝和东方有着一种持久亲密的关系。

也有学者从躲避水患和寻找铜矿等角度寻找迁都原因。²确实，殷墟比小双桥地势略高，也远离大河，且西部的太行山还有铜矿；但问题是，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关中盆地的老牛坡商文化遗址以及晋南地区的垣曲和东下冯商城遗址也都远离水患，临近铜矿。

殷墟的考古发掘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这个阶段，商人掌握了一种重要的技术——马拉战车，而这种技术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因此，盘庚向北迁都也许是为了更接近马的产地。

上述这些，都是从“理性”层面寻找盘庚迁殷的原因，但在商人的时代，“理性”只是影响决策的一部分原因，还有相当部分是由鬼神和占卜决定的。这些“非理性”因素虽然无法复原，却不能忽略。

洹北商城是盘庚王在洹河北岸规划的一座大型城池，基本是正方形（边长约2200米），夯土城墙底宽十余米，规模超过早商的郑州和偃师商城。显然，盘庚试图重建早商的黄金时代。

沮北商城的王宫区在城内中央偏南，有两座大型宫殿基址，闭合的四合院结构，主殿堂在北面。

一号宫殿基址很大，总面积近1.6万平方米（东西长约173米，南北宽约90米），犹如一座标准操场。这座宫殿的规模打破了以往的纪录，之后几百年内也无法被超越。由此亦可见盘庚王当时的野心之大，所以商人贵族乃至民众对迁都的抵触情绪并非毫无道理，毕竟新都 and 宫廷的建设成本会落到所有商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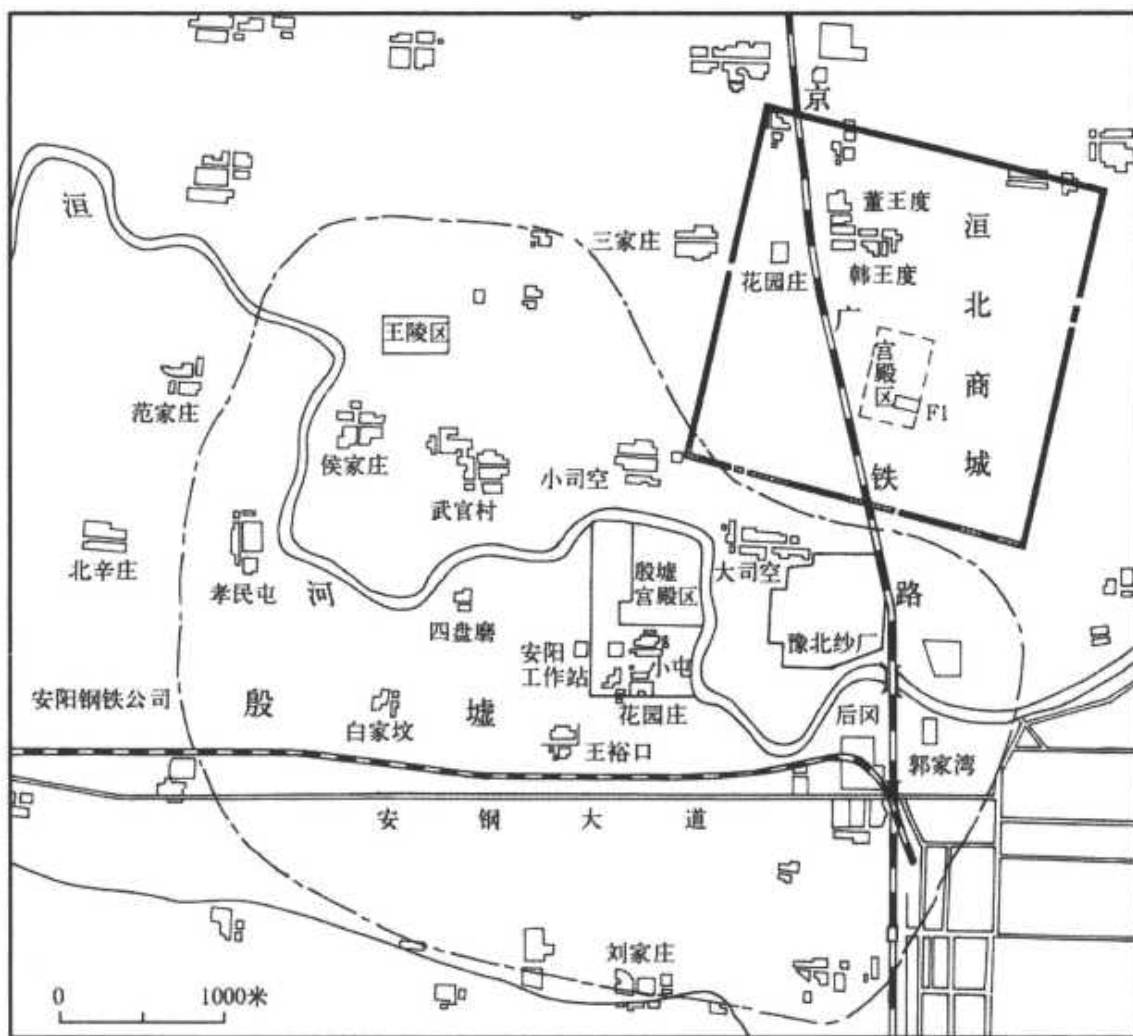
宫殿正室内有埋狗的奠基坑，有多座台阶通往庭院，且多数台阶东侧也都挖一座坑，埋一名奠基人。目前发表的简报信息有限，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座坑，以及坑内人的特征。其他的房屋和门房旁边也有奠基或祭祀坑，坑内主要是羊，或者是空坑，发掘者推测，可能是用酒和血祭祀。门房边的奠基坑也埋了一个人。³

二号基址规模略小，面积约0.6万平方米，目前只发掘了一小部分。它的祭祀坑内没有发现殉人。一口水井中有大量动物残骨，黄牛和水牛都有，黄牛占绝大多数。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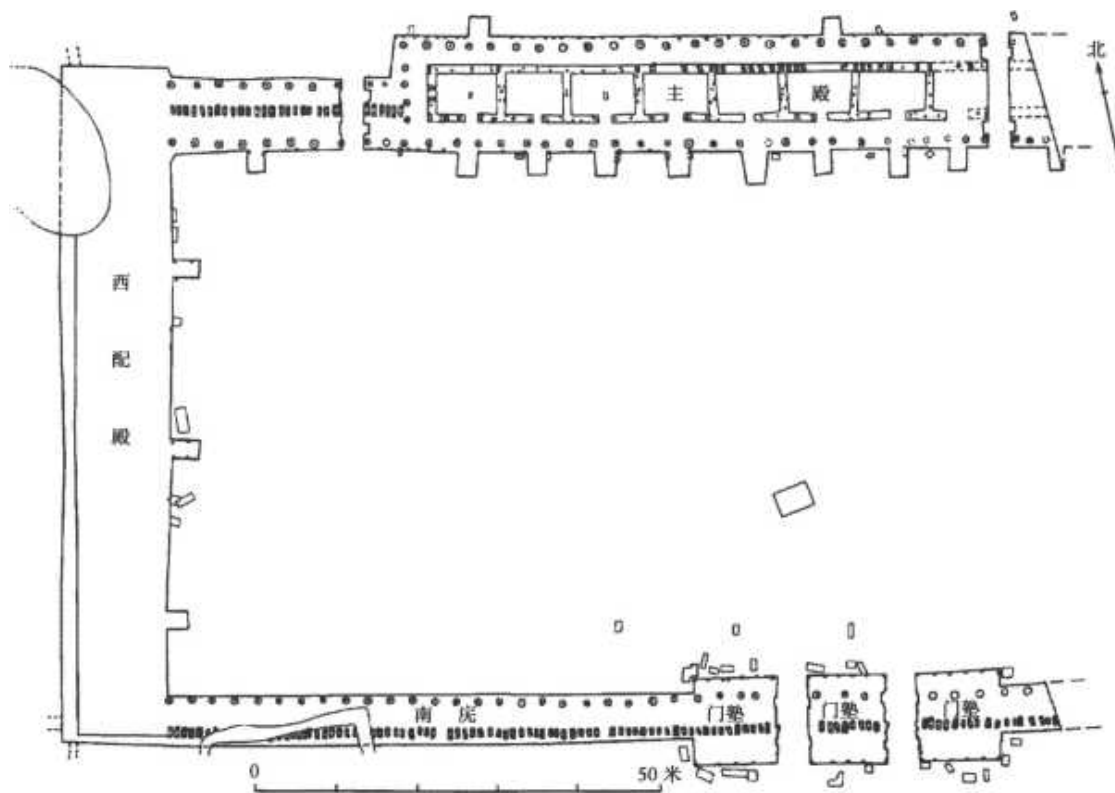
沮北商城使用的时间不长，很多城墙段落还没有完工，整座城池就被废弃了。然后，商人在沮河南岸营建了新的王宫区，多数族邑聚落也都坐落在恒河以南，这便是后世著名的“殷墟”。只是沮北商城被遗忘了三千多年，直到21世纪才被重新发现。

那么，商人是何时开始搬迁到过河南岸的？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看，最早属于第二十二王武丁时代。武丁是盘庚的侄子，他们中间还有两位商王，盘庚的弟弟小辛和小乙（武丁之父）。所以，沮北商城可能只经历了盘庚、小辛和小乙这三代，时间不超过五十年。

恒北宫殿区有大量烧毁迹象，如烧过的墙壁和屋顶倒塌形成的烧土堆积，有学者据此推测，可能沮北宫殿曾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武丁王认为这座迟迟未能完工的大城不吉利，便废弃了它，在恒河南岸建造了新的宫殿区。⁵



演北商城与殷墟遗址群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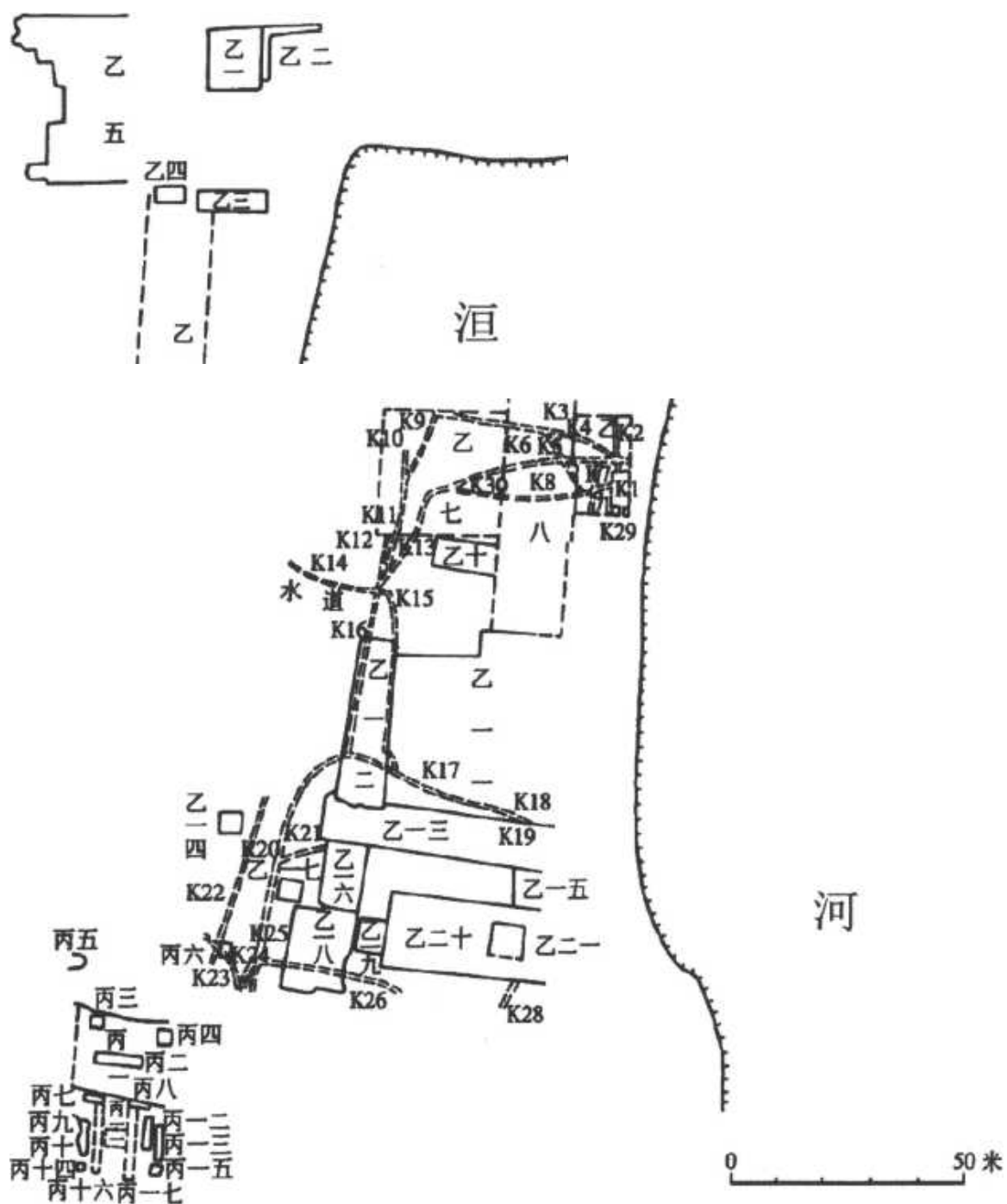


演北商城一号宫殿发掘平面图

*0 甲五D □甲-



亲口



殷墟宫殿区建筑

武丁王的新殷都

新宫殿区坐落在沮河弯内侧，今安阳小屯村北，“殷墟博物苑”所在地。

营建新宫殿时，武丁抛弃了之前的“城池”都城模式。他可能不相信商朝都城会受到外来威胁，认为与其耗费庞大的人力夯筑城墙，不如主动对外扩张。武丁规划的宫殿也不再是封闭的大院落，而是若干座彼此独立的大型建筑，皆有厚达1米的夯土地基、木柱框架结构和厚重的夯土墙，足以抵抗地震，且分散的单体结构也更利于防火。

王宫建筑大多面对着沮河和太阳升起的东方，南北狭长。最北端被划为甲区，是商王的主要生活区，有五六座主体殿堂，还有饲养禽鸟的苑囿，可能喻示商人的鸟崇拜信仰。宫廷杂役人员住的小房子则星罗棋布在周边。

在甲区，甲十一宫殿基址最大，南北长46.7米，宽10.7米。最大的木柱安放在圆形铸铜片上，而不是常见的柱础石。夯土中有一枚人头骨，但因为没挖开宫殿的夯土地基，尚不知道用了多少颗人头奠基。

甲十一西侧是甲十二基址，南北长20.5米，东西宽8.7米。两圈柱洞遗迹显示，这是一座有重檐结构的殿堂。在两个柱洞旁边，各发现一枚头骨，其中一枚是沿耳和鼻砍下来的半截人头。⁸

甲区面积不大，南北跨度100米左右。它的南端是乙区，这里殿堂更多，也更宏大，且每座大殿周边都有多座杀祭坑。考古学者推测，乙区是商王的宗庙区，供奉自商族始祖契以来的历代先王和先妣。

最大的祭祀区在乙七基址南侧空地。这里密集排列着100多座祭祀坑，用人数量超过600，还有马车五辆，马和牛数十头，羊和狗过

百只。有些坑中埋的是被砍了头的密集尸骨。也有些是单人坑，人牲携带兵器，被摆放成跪坐、手持戈盾造型。殷墟博物苑复原了部分乙区祭祀坑，还加了玻璃顶盖做露天展示，以方便参观者直面商王朝的独特气质。⁹

乙区也是商王议事办公的主要场所，因为重大决策需要用甲骨占卜请示历代先王，所以宗庙也是议政堂。有些御用占卜师也住在这里，以随时给商王提供服务。紧挨着人祭区的乙十二殿堂旁边，有一座窖穴YH127，里面堆放着1.7万多片甲骨，主要是龟甲，经过释读，是武丁王时期的卜辞。这里可能是一座卜甲储藏室，过期之后被填土埋藏。甲骨堆里还有一具完整尸骨，发掘者推测是甲骨保管人，最后被“随葬”给了甲骨档案，成为守护窖穴之鬼，保护着这个秘密长达三千多年。武丁王留下的甲骨很多，在殷墟的散布范围也更广，远不止YH127。

乙区祭祀坑大都是供奉给先祖的，但王宫区面积有限，几次祭祀就可以用掉这片广场，武丁只好在沮河北岸规划新的王陵区和祭祀区。此后，乙区殿堂的宗教职能减少，功能上逐渐向甲区靠拢。占卜师家族的繁衍也很快，他们向南搬迁了数百米，在今小屯村一带形成了新的占卜师聚落。¹⁰

在乙区西南侧十余米处，是被发掘者称为丙区的部分。这块基址范围很小，方圆不过三十米，而且遗迹很特殊，只有一些窄小的夯土台和祭祀坑。有五座祭祀坑埋有被砍了头的人，其中一座埋有20人，其余四座都是3人；有些祭祀坑埋的是狗和羊；有八座则填满黑色灰烬，混杂着羊骨；还有些是空的。灰烬是焚烧祭品的“燎祭”遗存，空的坑里献祭的应该是酒和血。由此推测，这些窄小的夯土台不是普通建筑，而是献祭的祭台，用来屠杀、分割人和牲畜，摆放祭品。

商王的祭祀有很多种，直接埋入地下的只是一部分。在甲骨卜辞里，商王也常祭祀自然神，有四方风、鸟、河、岳等，对这些神，经常使用燎祭。丙区的祭台和祭祀坑可能主要供奉自然神。¹¹

乙区和丙区的东南侧，也就是发掘者称为“丁区”的部分，有一组大型建筑，可能是商朝王室的“大学”，我们后文会详细介绍。

商人各族邑聚落星罗棋布在王宫外围，形成直径达五六公里、广阔而松散的“殷墟遗址群”，地跨阻河南北，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

每座族邑聚落都是一个基本独立的经济单位，周边是自己的农田和牧场，也大都有自己擅长的手工业作坊，如铸铜、制骨、制陶等。此夕卜，肯定还有不容易留下遗迹的产业，如纺织、印染、木器（造车）、皮革和食品加工等。

武丁王建设的殷都使用了 200年左右，虽然有过小规模改建和扩建，但基本格局一直未变，直到商朝终结。

刚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殷都如此庞大而松散，毕竟，最初的“殷墟”概念只是小屯村北出土甲骨的王宫区。所以，初期的保护区范围非常有限，甚至安阳市西北郊还被规划为钢铁工业 区，结果，大量商代遗址遭到破坏。

在工厂、楼盘、铁路和机场的缝隙中，仍不时有商代族邑被发掘出土，它们普遍用人祭祀、奠基和殉葬。这是商文化，也是中国上古人祭文化最后的“辉煌”。

王陵与殉葬人

宫殿区向西北方5公里外，是殷都王陵区。

从1935年开始，王陵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已发现十多座王级墓葬，墓穴的边长都超过10米，有的甚至20多米，深度也超过10米。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王级墓区，有些因地下水涌出而无法发掘。

墓穴在建造过程中，一旦挖得过大过深，运土和安置棺槨等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为此，需要建造缓坡形的“墓道”以方便进出。王陵区的大墓中，四墓道的有八座，双墓道的有三座，单墓道的有两座。茛

从空中俯视，四墓道大墓呈十字架造型，其中，M1576的挖掘尚未完工，只挖出部分方形墓穴，没有墓道，也没有埋藏物。有学者推测，它是末代纣王帝辛给自己建造的墓穴，但后因纣王身死国灭，墓穴没有被使用。

这些王级大墓周围，还分布着一些王族显贵的墓。

商人高级墓葬的建设程序是，先挖掘墓穴和墓道，然后在墓穴底部挖出方形的墓室，里面用木料搭建槨室，犹如一座木房子。槨木往往雕花，刷红漆，造型美观，槨室内则放置棺木和最珍贵的随葬品以及墓主最贴身的殉人。墓主入葬后，槨室顶部会盖上木料，接着在墓穴二层台继续放置随葬品和殉人，然后填土，逐层夯筑，直至大墓完成。

有些埋葬在王墓二层台上的殉人地位较高，有自己的棺材，也有青铜兵器和礼器以及玉器随葬，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名随葬人。

可惜的是，王陵区所有的高等级墓都遭到严重破坏，不仅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墓穴结构和棺槨构造也多被挖毁或焚烧，基本无法判断这些王陵属于哪一位商王。

王陵的墓穴和墓道里还残留着大量殉葬尸骨。殉人的程序是：一，先在椁室底部挖若干坑，分别埋入一人或一狗，人多持青铜和玉石兵器，身份是墓穴守卫者。这是商人“腰坑殉狗”葬俗的豪华版本。二，安置完这些殉人和殉狗后，再搭建椁室。三，在墓中各处摆放殉葬人，如棺椁外、墓穴内、墓穴边缘土台和墓道，甚至对墓穴填土夯筑时，也会继续埋入完整或被肢解的殉人。每座王陵的殉葬者至少有数百人，这还是被严重破坏之后的数字。

有些墓穴和墓道因装不下过多尸首，所以会只埋入人头。比如，

M1550大墓埋有243枚人头骨，北墓道摆放235枚，南墓道摆放八枚，多数都带着几节颈椎骨，发掘报告认为，这“证明当时是将人头砍下，连皮带骨地埋在夯土中”。这些殉人的尸骨，则被埋入依附于王陵的殉葬坑群：王陵旁有成排的长方形坑，尺寸类似单人墓穴，每座坑里都密集埋有十来具无头尸骨。其他王陵也有类似现象。

在王陵区大墓中，最东端的50WGM1遭受的破坏稍轻一些，还能看出一些基本的墓葬结构。它有南北两条墓道，在王陵区属于规模较小的王级墓葬。椁室内部虽然已经被破坏，但东西二层台上的殉人基本完好：东侧葬17人，其中E9棺随葬铜戈三件，铜簋、铜爵、铜壁和铜觚各一件，以及驾驭马车的铜弓形器一件，说明这位殉人拥有自己的车马。西侧葬24人，其中W8棺随葬铜戈一件，铜鼎一件，铜觚和铜爵各两件，此外，还有玉器和各种小件铜器。发掘者推测，E9和W8分别是东西殉葬队伍的首领。

比较可见，西侧24人共随葬玉器十件，小巧的铜戈三件；东侧17人共随葬玉器五件，厚重实用的铜戈六件。西侧，人骨多腐朽；东侧，人骨多健壮，保存完好。他们可能分属墓主的两种家仆，东侧

负责保卫和战斗，西侧负责家务。此外，北墓道内埋了二人、四犬和16匹马，是墓主的出行车马队。

整座墓发现殉葬者全尸45具，头骨34枚，还有犬、马、猴、鹿以及难以辨别种类的动物骨骼。该墓也在后期被破坏，这只是残存的数量。大破坏前，破坏者在50WGM1墓穴口挖了一个直径6米的破坏坑，向下直达椁室，先是洗劫了所有物品，然后点燃了棺椁，大火烧红的椁室土壁足有2厘米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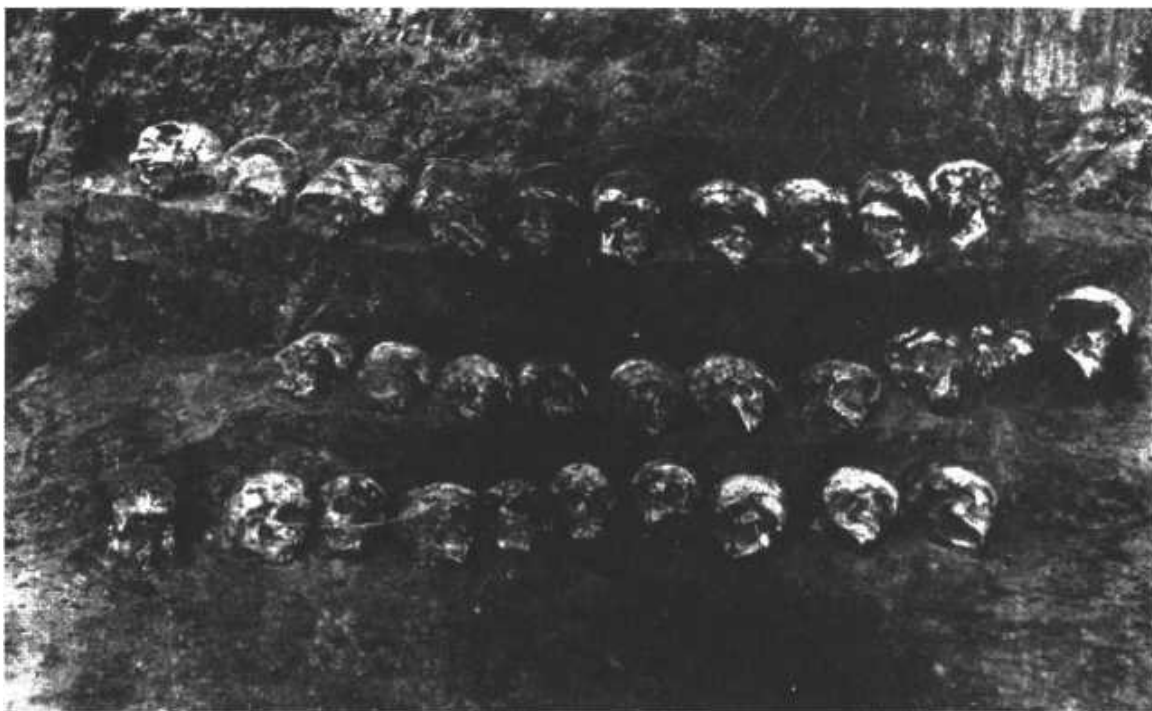
虽然被严重破坏，有些王陵里还是能发现一些出人意料之物，如巨大的鲸鱼骨头，看来商人与海洋一直有某种联系，只是现存的甲骨文从未记载这些，我们也就无从知晓细节了。



发掘中的王陵区 M1550 大墓¹⁵



刚发掘完的双墓道大墓50WGM1¹⁶



墓道里成排的人头，每排10个

密如繁星的人祭坑

除了王陵下葬时的殉葬者，商王每年都要祭祀历代先祖，而这需要大量人牲。

在王陵区的东半部分，有成排、密集的小型墓坑，里面填埋了多具身首分离的尸骨。1934—1935年，中央研究院的考古队在这里发掘了 1221座“小墓”，其中少数是殉葬坑，多数是祭祀坑，但发掘的 详细资料一直没有发表。

此后，王陵区又多次发掘出祭祀坑，如1950年、1959年、1976年、 1978年，每次都发掘数十甚至上百座，加上已经钻探定位、未经发 掘的700多座，累计发现祭祀坑2200座左右。直到2021年，还有新 的祭祀坑陆续被发现。